

《庄子》鲲鹏情节图式的四灵观发微*

杨秀礼**

摘要：《庄子》鲲鹏用象至少有变形互化（鲲化为鹏）与独立并存（鲲鹏共时并存）两种情节图式。据所处方位与物种族属，鲲鹏可分别对应四灵中的北方水族玄武、南方鸟族朱雀二灵；当视四灵为四时运转象征时，鲲鹏展现为动态变形互化图式；当视四灵为四方指称象征时，鲲鹏便可为静态共时并存图式。《庄子》鲲鹏情节两种图式所暗蕴的四灵观念，关联着战国时期时空互渗等思想，突显了《庄子》与战国时代文化的能动互文关系。

关键词：《庄子》 鲲鹏 情节图式 四灵观念

《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作为追求精神超越的一种艺术化表达，其精彩的打开方式形成了强大的磁场力，古贤今哲已从哲学、文学、美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学界对鲲鹏情节也进行了源流研究，但目前尚有待辨明之处^①。康德认为在理性范畴与感性表象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先验名为“图式”的媒介，《庄子》鲲鹏情节作为感性表象，与其文本完成创制时的战国思想文化，尤其是四灵观念等理性范畴关系密切。笔者力图从《庄子》鲲鹏情节图式入手，就其与战国四灵观念的关系进行知识还原性解读。

因擅长以诗性话语方式建构思想体系，《庄子》奠定了自身在中华美学、哲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诸子学通史”（19ZDA244）阶段性成果。

** 杨秀礼，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诸子与经学研究。

① 如郭象已有“鹏鲲之实，吾所未详”（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3页）的感叹；崔大华更直言“《庄子》中的这类‘物化’描写（鲲鹏情节为崔氏所举《庄子》重要的物化案例——引者注）还有很多，但基本上不外乎这样三种观念成分：一是诡谲荒诞的寓言或神奇传说；二是没有验证的、不确切的生活经验；三是缺乏具体环节和思维过程的哲学洞察——‘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崔大华：《庄学研究——中国哲学一个观念渊源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学传统中的经典地位。丰富的用象及精彩的经营方式是《庄子》文本诗性特征的突出表现，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刻者概非“鲲鹏”莫属，《逍遥游》篇可见相关材料共有三条，兹胪列如下：

其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其二，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其三，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材料所言均为鸟（鹏）飞往南冥，除材料二引“齐谐”缺失对鱼的交代外，材料一（即《逍遥游》首章）讲述鱼化为鹏再南飞，材料三（即《逍遥游》“汤之问棘”章）讲述鸟鱼并存而鸟南飞，这种差异形成了鲲鹏情节变形互化、独立并存的两种类型。对于这两种情节图式，在以《易》解《庄》思潮流行的宋代及之后，学者逐渐有所关注与探讨。

通天下一气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与阳其本未始有异也，一
进一退，一北一南，如环之无端。内之一身，外之万物，随之以消息盈
虚者，莫非是也。……阳数奇、阴数偶，阳生于子而终于巳，阴生于午
而讫于亥。鹏，阳物也，故其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
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三与九，皆数之奇。六月则子与巳、午与亥
之相距也。言鹏之数奇而去以六月息，则鲲之数偶而来以六月消，可
知也。^①

吕惠卿从以道为气、气分阴阳是天下万物生成的基本方式切入，自觉将其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相结合，根据方位、时辰、阴阳属性的对应关

^① 吕惠卿：《金刻本庄子全解》（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

系，主张作为时间概念的子时对应方位为北，属阴，巳时对应方位为南，属阳，鹏为阳物，故终将“徙于南冥”，归处南方。吕氏同时倡导阴阳互生，认为“如环之无端”是世间万物得以运行的基本规律，阴阳（鲲鹏）在循环运动中互化。此后林自、陈详道进一步发展了吕惠卿的观点。林自认为“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则阴阳之所出入也。庄子以鲲鹏明阴阳变化，故以北冥为始。鲲，阴物也。鹏，阳物也”^①，将“后天八卦”中北方《坎》卦取象为“水”，是为冬藏、阴阳所出入，与《庄子》鲲鹏意象进行勾连。陈详道的论述则更具体化，他认为：“水于方为北，于气为精，于时为冬，于数为一。物之化也，常始于此。夫鲲之为物，阴中阳也；鹏之为物，阳中阴也。潜北徙南，不离阴阳之方。九万六月，不离阴阳之数。”^②由此解释了鲲化而为鹏的内在动力机制，即方位北取数为一，是生数之始，是化生力量的起始。同时，陈氏还开辟出了以《周易》卦象及丹道解读鲲鹏情节的路径。

北海，坎卦之象；南海，离卦之象。鲲即坎之中爻，鹏即离之中爻。鲲鹏变化，自北之南，正取坎填离之喻，盖坎北离南，后天之卦象；乾南坤北，先天之卦象。鹏徙南海，由后天而返先天。邵子所谓先天之学，正指此也。^③

藏云山房主人借用后天八卦所涉观念，以北海为《坎》卦之象，南海为《离》卦之象，而鲲鹏则分别为《坎》《离》两卦的中爻，是陈详道“夫鲲之为物，阴中阳也；鹏之为物，阳中阴也。潜北徙南，不离阴阳之方”更具体化的呈现，只是前者将北冥之鲲向南冥之鹏转化的动力机制解读为《坎》《离》二卦中爻的阴阳运转互化而已。苟爽注《乾卦·彖辞》“大明终始”曰：“《乾》起《坎》而终于《离》，《坤》起于《离》而终于《坎》。《离》《坎》者，《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故曰‘大明终始’也。”李道平作了进一步疏解：“《坤》二五之

^① 《道藏》（第十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② 《道藏》（第十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③ 龚鹏程、陈廖安主编：《中华续道藏》（初辑第十二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第22页。

《乾》成《离》，《乾》二五之《坤》成《坎》。《坎》《离》为天地之交，而得《乾》《坤》之中者也。《坎》本《乾》之气，故《乾》起于《坎》之一阳，而终于《离》之二阳。《离》本《坤》之气，故《坤》起于《离》之一阴，而终于《坎》之二阴。《乾》寓《坎》中，《坤》寓《离》中，故《坎》《离》为‘《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也。”^①以《周易》中《乾》《坤》《坎》《离》四卦之象及其运行互化方式解读鲲鹏互化的情节生成机制，将鲲鹏互化视为丹道修炼的一种文学化演绎，是契合丹道修炼语境的：《坎》（北海）之中爻阳（鲲），与《离》（南海）之中爻阴（鹏）运转互化得以实现，即《坎》《离》卦运转而化成《乾》《坤》卦，这是由后天向先天的运转，也是鲲鹏运转互化的完成过程。尽管吕、陈、林三人与藏云山房主人对鲲鹏阴阳属性的认识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在试图运用以《易》解《庄》的方式阐释鲲鹏化为鹏情节生成的文化机制。

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传统学术受到极大冲击，视野却由此变得开阔，并获得持续创新的动力。就鲲鹏用象及其情节图式而言，神话学方法的引入是亮点之一。学者利用文献记载如《山海经》《大戴礼记》及相关出土文物、文化人类学材料等，将鲲鹏情节分为鸟鱼互化、卵化为凤（卵—鸟 [鹏或凤] —太阳）等类型进行文化性探讨，又将鸟鱼互化类型分为承续性神话（鲲化为鹏）和鱼鸟独立共存性神话（鲲鹏并举）两个亚类型。青年学者刘勤的讨论已涉及鲲鹏互化及运动图式。^②在发生学方面，刘勤认为鸟（鹏）的运行是对太阳运行的一次模拟，将鲲鹏视为一体两形，即太阳的上升和下落为鸟和鱼所代表的白昼和黑夜的运动过程，是宇宙生命周期性再生观念的一种展示。

上述阴阳象数研究作为传统学术方法的代表，立论基础是《易》《庄》学理的同源性，关键在于阴阳象数发生的语境与《庄子》知识类型的契合度，后文对此将另作详论。以取《坎》填《离》为核心的丹道说是运用《易》学解读鲲鹏图式的一种发展，虽契合文本，但作为后出理论其附会性质也十分明显。鲲鹏情节的神话学解读，主要集中于鸟鱼类型与《庄子》寓言的神话性方面，缺少对征引文献材料的真伪、创制时代等的详尽考辨，无法得出研究结论。更为重要的是，

① 李道平撰，潘雨廷点校：《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第36页。

② 刘勤：《由鲲鹏神话论及鱼鸟互化运动图式》，《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目前以《易》阴阳象数为代表的传统性研究与以神话学为代表的现代性研究，均能较好阐释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消灭为前提的鲲鹏互化类型，但对鲲鹏共存类型^①的研究则尚未臻于圆满^②，有待运用新的材料、方法作更深入的推进。

二

《庄子》文本及其创制时代四灵思想体系的发展水平，是鲲鹏情节图式的四灵观念元素讨论展开的基本前提之一。四灵或称四维、四宫、四兽、四神、四象等，作为我国天象、地理方位概念，乃至神灵崇拜的象征体系，它深深根植于传统中国的普遍信仰，与原始先民的思维及生存状态关系紧密。正如韦纳（Heinz Werner）所言：“对原始人来说，空间的观念即使在系统化之后，也总是与主体密切地结合着的。它更多地是一个表达感情的具体的概念，而不是具有发达文化的人所认为的那种抽象空间。”^③ 四灵作为中国传统星象体系的最基本概念，直接源自先民基于生活生产需要产生的对天象及星宿的信仰和膜拜。从现有的材料考察，先民对星象的掌握程度远超当下一般预期，更非为若干天象学家所世袭垄断。“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④ 时至战国，四灵观念的知识结构体系已较为成熟（下节对此将有更多讨论），这为《庄子》鲲鹏情节的生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知识背景。《庄子》对此类知识已有相当的掌

① 鲲鹏共时并存情节在通行《庄子》文本中虽仅此一例，但在《庄子》文本创制前后，相似类型已常见，上举刘勤一文已专门作过鱼鸟共存性神话类型考论，故此种类型当非《庄子》慧心首创，而与时代风潮相关。

② 刘勤一文曾探讨鲲鹏作为鱼鸟共存性神话，在类型与相关情节罗列的现象性分析上成绩较为突出。且以太阳起落隐喻鱼鸟阴阳昼夜的转化，是很好的尝试。太阳起落方位为东西，鲲鹏转化方位为南北，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刘文惜未给出合理解释。但以天象解释鲲鹏转化机制方式，给本文提供了有益启示。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④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73页。

握^①：四灵与阴阳观念关系紧密，《庄子》文本包含较丰富的阴阳易理学说，《天下》篇所言“《易》以道阴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具体点明《周易》这一特点的文献记载。“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则阳》），“阴阳和静，鬼神不扰”（《缮性》），等等，无不说明《庄子》文本创制吸取了《周易》及其时代有关阴阳学说的某些观念。可见吕惠卿等以《周易》阴阳象数学说解读《庄子》，并非单纯的经验性推论，而是契合了《庄子》的知识背景。用与《易》理相关的阴阳象数学说解读鲲鹏情节图式是符合《庄子》文本特征的，遑论《庄子》对相关星象及由此敷衍出的故事情节已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大宗师》）

引文与天文星象相关者共有两处：一是“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成玄英指出：“维斗，北斗也，为众星纲维，故谓之维斗。忒，差也。古，始也。得于至道，故历于终始，维持天地，心无差忒。”^② 维斗为北斗星的别称，在天文星象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傅说“比于列星”为星宿。“司马云：‘傅说，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东维，箕斗之间，天汉，津之东维也。’《星经》曰：‘傅说一星在尾上，言其乘东维，骑箕尾之间也。’崔云：‘傅说死，其精神乘东

^① 目前流行的《庄子》版本为郭象删定本。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至宋代陈景元统计《庄子》文本时仅存 65923 字（《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又据《汉书·艺文志》所言，“《庄子》五十二篇”，今本《庄子》仅存 33 篇。郭氏等的删减力度由此可见。《庄子》被删减文字多为“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并且具有“妄宰奇说”，“辞气鄙背，竟无深奥”等特征，这一按断也为目前所辑《庄子》佚文所证实。郭象等所删文字对于研究《庄子》的物化、阴阳，乃至四象相关思想等，应是重要而可信的材料，因学力与资料所限，笔者只能付之阙如，以俟来者。

^②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47、249 页。

维，托龙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傅说星。’”^①傅说是殷高宗之相，相传他死后精神假托于星宿。既然对组成四灵的单颗星象已有较多认识，根据由整体到个别的一般星象认识规律，《庄子》对四灵本身蕴含的相关文化信息也应有所了解，如再辅之以如“管窥天”即“窥天管”等仪器，对星象观测的掌握就更进一步了。“管窥天”最早出自《秋水》篇，中国早期的天文学家正是使用这样较为原始的仪器来观测天象的，“窥管”可以说是早期大型天文仪器的雏形。^②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招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天运》）

《庄子》对宇宙起源、自然运行提出了人类思维式问题，并借巫咸之口作出解释。巫咸据传为殷中宗相，是以筮占卜的创始人，也是一位星占家，后世流传有假托他所测定的恒星图。“巫咸”见于《应帝王》篇时为“季咸”，他预知生死祸福主要依靠的是对阴阳运转的观测，而非沟通神人的巫术性能力。《天运》篇文本的这一设计，暗示了《庄子》对包括阴阳、天文及其运行相关知识的熟悉程度。天文星象是四灵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是最核心的质素，《庄子》对这一知识的了解掌握，使四灵观念介入鲲鹏情节图式成为可能。

三

“四灵”作为知识结构体系，既包括四灵及其组合，也包括四灵组合所包蕴的天文、地理、时令及其运行方式等观念的生成发展过程，至迟在战国时代已较

①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755页。

② 陈夕朦、王洪鹏：《“窥管”与古代大型天文仪器的发展》，《科技导报》2014年第20期。

为成熟，同时存在由天象朝地理方位转化的趋势^①。《礼记·曲礼》^②曰：“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郑玄注：“以此四兽为军陈，象天也。”西周时期军队的行军驻扎已开始效法天象四灵的布局，这既有保护军队的神秘意涵，也暗示了四灵具有地理方位指向性功能。^③《鹞冠子·天权》^④曰：“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说明四灵已有指示四时的功能。四灵所同时具有的标示二维时空的特性，应直接源于原始人类的思维模式：“空间已从地上转到了天上。但是在转向天的现象的秩序时，人类不可能就忘记了其地上的需要和利益。如果人首先把他的目光指向天上，那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理智好奇心。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人感到了他自己的世界是被无数可见和不可见的纽带而与宇宙的普遍秩序紧密联系着的——他力图洞察这种神秘的联系。”^⑤战国时代的四象观念已成熟至足够支撑《庄子》鲲鹏情节图式。先秦四象体系既涵盖天文性的星象概念，又包蕴地理性的方位意识，还包含时间即四时概念，是时间和空间综合融汇的观念体系。如此，四灵观念与《庄子》鲲鹏情节图式便具有潜在的契合性。

作为四灵的“玄武”和“朱雀”，所处方位和物种属性与“鲲”“鹏”均相接近。“玄武”居北方为鱼类，其形象一般为龟或龟蛇合体^⑥；鲲居北冥（方），所

① 对于与此相关的八卦卦位说，即《周易》八卦和时间、空间结合的学说，廖名春认为：“《周易》本经内涵阴阳观念和卦气学说，是信而有证的。”（廖名春：《〈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五考》，《周易研究》1999年第1期）即廖氏认为，在《周易》产生前后，先民已有将时间、空间相互结合并转换的意识。

② 关于《曲礼》成篇年代，沈文倬认为当早于《孟子》[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王锷认为大概写成于春秋末期战国前期（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第104—110页）。

③ 关于行军以四象表示方位这一现象，孙作云依据《诗经·小雅》的《六月》《出车》等诗篇的记载，并结合《礼记》文献，认为西周时既已产生。[孙作云：《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画像石墓雕像考释》，《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另，关于四象作为军队保护神的功能，可详参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之《军旗》部分的相关论述。

④ 《鹞冠子》，《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在道家，班固自注作者为“楚人，居深山，以鹞为冠”。唐后有疑似伪托之说，马王堆帛书有不少语句与《鹞冠子》相同，思想也较接近，故《鹞冠子》为先秦古籍可信，定稿时间当在战国末期（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鹞冠子〉》，《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⑤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6—67页。

⑥ 据出土资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四象”并未严谨对应苍龙、赤鸟、白虎、玄武四物，尤其是作为北宫（北方）的玄武，在战国前期之前，主要还是以鹿（麟）为代表，虢国铜镜（公元前9—前7世纪）、曾侯乙星图（公元前5世纪末）等出土文物均如此。在《礼记·曲礼》及战国后期的《鹞冠子》《楚辞》《吕氏春秋》中已将玄武作为北方灵物或方位的代指。

指本为小鱼。“《尔雅》云‘凡鱼之子总名鯢’，故《内则》‘卵酱’读作‘鯢’。《论语》亦曰：‘鱼禁鯢鲋。’皆以鯢为鱼子。庄子乃以至小为至大，此便是滑稽之开端。”^① 鯢与“玄武”为同居于北方的水族。“朱雀”居南方，为鸟类，形象一般呈现为凤凰^②；鲲鹏情节中的“鹏”，从“海运则将徙于南冥”来看，其最终所居方位当为南方。《经典释文》认为：“鹏即古风字，非来仪之风也。《说文》云：朋及鹏，皆古文凤字也。朋鸟象形。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朋为朋党字。《字林》云：鹏，朋党也，古以为凤字。”^③ 战国文人宋玉曾说道：“故鸟有凤而鱼有鯢。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④，这显然与《庄子》的鲲鹏情节具有同源性，唯一的区别在于宋玉将《庄子》的鹏直接表述为凤。“又东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辄入，夏乃出，冬则闭。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鹓雏”^⑤，《山海经·南次三经》认为凤凰与鹓雏共居于南禺之山。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秋水》）

在以庄子为人物的描述中，鹓雏作为寓言形象，与凤凰相似，居处南方，两者的生活习性也高度接近：

-
- ① 《道藏》（第十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② 有研究认为，周人存在“朱雀”（赤鸟）崇拜，并与凤鸟崇拜紧密相关（王晖：《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从考古来看，纵览所有的朱雀造型，可发现它的形象与商周铜器上的“凤鸟”造型一脉相承（成倩：《“朱雀”的形成及与“凤凰”的混淆》，《学术探索》2014年第9期）。
 ③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733页。
 ④ 宋玉：《对楚王问》，载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628页。
 ⑤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巴蜀书社，1993年，第23页。

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实，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①

据上引《庄子》佚文，凤凰与鹓雏不仅均居处南方，饮食特性也较相近，故《经典释文》曰“鹓雏乃鸾凤之属也”，由此可确认凤、鹏、鹓雏的种属关系。

鲲鹏与“四灵”玄武、朱雀的对应关系既已明确，根据“四灵”包蕴的文化信息，当将玄武、朱雀视为不同的方位概念时，玄武、朱雀（鲲、鹏）是可共存的，此为《庄子》鸟鱼共时并存图式。鲲化而为鹏的图式因与天象运行关系紧密，情况更为复杂，上文所言《鹖冠子·天权》中“四灵”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时概念，以及《易》解《庄》学派对鲲鹏所取卦爻象与其代表方位的强调等，对此均已有所揭示。玄武方位为北，时令为冬，冬为敛藏时节，与鲲潜于北冥相近。《玉烛宝典》载《庄子》佚文“东风解冻，蛰虫始震，鱼上戾冰，獭祭鱼，鸿雁来”，司马彪注：“言冬日冰鲠涩不通，春日微温，毁池冰而为道者也。”^② 在《庄子》看来，鱼类有冬季潜藏、春季破冰游行的生活习性。最要紧的是，当四灵与四时结合后，其规律性运行过程变得更为清晰，也易于掌握。四时运行由冬而春而夏而秋而回归为冬，对应的方位则是由北而东而南而西而返至北，循环往复如“环之无端”。北“玄武”之鲲，经运行化而为南“朱雀”之鹏（凤），鹓雏（凤）又由南往北飞翔^③，由此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循环结构。此即吕惠卿所言“六月则子与巳、午与亥之相距也。言鹏之数奇而去以六月息，则鲲之数耦而来以六月消”。相对于鲲化而鹏，鹓雏（凤）由南而北的时间节点及具体物化情节等，在郭象删减本《庄子》中已很难找到具体描绘^④。所幸《大戴礼记》等与《庄子》时代相近之材料可资补充

①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558页。

② 杜台卿：《玉烛宝典》，载《丛书集成新编》（第4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24页。

③ 将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解读为庄子以“鹓雏”自喻由宋之梁，即由南之北的空间隐喻也通顺。

④ 《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提到众多物化故事情节时，已有“燕之为蛤”的记载（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3943页）。

完善，如《易本命》^①曰“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为蛤”^②；《夏小正》^③曰“九月……雀入于海为蛤”，又“十月……雉入于淮为蜃”，郑玄注：“大水，淮也；大蛤曰蜃。”《礼记·月令》也有“季秋之月……爵（爵即雀——笔者注）入大水为蛤”的类似记载^④。可见在《庄子》成书时代，深秋初冬时节，鸟类（燕雀、雉）入水变形为鱼类（蛤、蜃）的说法已被较为广泛地接受^⑤，这恰可与《庄子》互为补充，形成完整的鲲鹏情节图式（见表1）。

表 1

四灵	玄武	【青龙】	朱雀	【白虎】	玄武
季节	冬	【春】	夏	【秋】	冬
方位	北	【东】	南	【西】	北
《庄子》	鲲	化（徙）	鹏（海鸟）、鸩	飞	？
《大戴礼记》	？		燕雀、雉	入于海	蛤、蜃
《礼记·月令》	？		爵（雀）	入于水	蛤
故事模式	鱼		鸟		鱼

注释：（1）鱼鸟变形情节虽未出现于春、秋两季即东、西二方位，但作为鱼鸟变形的量变积累过程，在时空形态上它们是暗含存在的，故用【】予以揭示，而“化（徙）”“入于海（水）”等则是鱼鸟互化行为方式，置于东、西二方位是权宜考虑。

（2）鸩鸩飞翔时间据《大戴礼记》补充，所化何物不详，以“？”表示。

- ① 《易本命》是儒家学者利用易学原理来演绎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规律的文献。甘良勇考证其大约产生于战国晚期（甘良勇：《〈大戴礼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2012年）。
- ② 有研究认为燕鸟是殷商部族的风凰原型，故载籍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中玄鸟即燕子。又，饶宗颐提到“玄鸟在华燕鸟之外，亦以凤凰为代表，其事甚早，惟与火结缘，则似出于楚人之说”（饶宗颐：《佛书之鸟夷与古印度火祭之“玄鸟崇拜”》，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第86—87页），饶先生后来对此观点又有所修正补充。
- ③ 《夏小正》是现存最早的时令类文献，有观点认为其应成书于西周时期。甘良勇通过分析《夏小正》文本语言特点等，认为其成篇于春秋晚期（甘良勇：《〈大戴礼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文学院，2012年）。
- ④ 上述《礼记》所载相关物化情节作为物候现象，同时见于《逸周书·时训解》中。据黄怀信考证，此篇当作于春秋鲁襄公前后时期（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 ⑤ 如春秋时期赵简子曾有“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鼃鼃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52—453页）的感叹。

(3)《大戴礼记》《礼记·月令》中燕雀、雉、爵(雀)原为何物不详,以“?”表示。

当以朱雀(鹏)、玄武(鲲)为夏冬二季的指称时,四时循环运行形成互化关系,这是《逍遥游》首章鸟鱼变形互化图式的文化机制,即表1横向箭头轴所示;当以朱雀(鹏)、玄武(鲲)为南北方位的指称时,鲲鹏是静态共存关系,此为《逍遥游》“汤之问棘”章鸟鱼共时并存图式的文化机制,即表1纵向箭头轴所示。必须指出的是,“汤之问棘”章鸟鱼共时并存图式中鲲鹏均始居处北方,但鹏往南而飞,以南方为归宿,故视鹏为南方之物是合适的。由此可见,战国四灵时空互渗观念确为《庄子》鲲鹏情节图式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背景支持,两者形成了互文关系。

鲲鹏是《庄子》文本最为恢宏的图文意象,尽管作者注入了许多个性化元素,借以抒发个人情怀,但相关情节图式与其时代文化背景的关系更为紧密。本文基于解构、知识还原等理论所获得的相关鲲鹏情节认知结构,与《庄子》及其时代的整个思想体系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深层联系,可为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继续深入探讨《庄子》文本、后世鸟鱼意象经营机制等提供思路启发。